

夫妻间如何称呼？为什么称父亲为“大(爷)”“叔叔”？

聊城民俗中这些称谓习惯背后有故事



聊风民俗

本报记者 陈金路

让很多聊城年轻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爷爷奶奶辈，夫妻之间称呼对方时，不喊名字，而是经常用“哎”“我说”等词语来代替，用以在对话中引起对方的注意。“这些称呼语实际上是夫妻称谓的一种替代形式，这类称谓也是聊城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1月6日，聊城民俗研究者孙小辰说，其实，聊城民俗中比较有意思的称谓还有很多。

夫妻之间面称背称不同
称呼对方父母也有讲究

现如今在城市里，婚后夫妻间，无论是对夫系亲属还是对妻系亲属，妻随夫叫，夫随妻叫，称呼对方父母皆为“爸爸”“妈妈”。而在聊城农村大多则不然，婚后，妻子对夫系亲属随丈夫叫，称呼丈夫的父母为爸妈；丈夫对妻子的父母则一般不随妻子叫，而是面称岳父为

“大爷”，岳母为“大娘”，即便岳父岳母年龄比自己的父母小，也要叫岳父岳母“大爷”“大娘”，不能喊“叔叔”“婶子”。丈夫对妻子的其他亲属一般与妻子的叫法一样，该喊舅的喊舅，该喊姨的喊姨。“这些民间的称谓习俗还有封建社会遗留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印记。”聊城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孙雪岩认为。

现在夫妻之间的称谓，有的面称直接喊对方名字，有的是称呼妻子“媳妇”，称呼丈夫“老公”，背称“俺媳妇”“俺老公”。20世纪80年代以前，聊城夫妻之间的称谓是一种缺失的状态，夫妻在家里说话时，没有任何称呼，直接用“哎”“我说”等来替代，这样夫妻之间会很默契地知道对方在跟自己说话。在外时，夫妻之间面称往往从儿女的角度称呼对方，比如自己的儿子叫小虎，女儿叫小花，就喊“小虎他爹”“小虎他娘”“小花她爹”“小花她娘”。夫妻之间背称时，往往丈夫称呼妻子“俺家里”“俺那口子”“小虎他娘”“小花她娘”等。妻子称呼丈夫往往用“当家的”“小虎他爹”“小花她爹”等。

“长期以来形成的夫妻之间的民俗称谓，看似普通，实际上蕴含了尊卑有序、主从有纲、男女有别的传统宗族制度，这种琢磨起来很有意思的夫妻称谓也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不过，随着

社会的发展，这种称谓逐渐被更加直接的称呼方式所替代。”孙小辰说。

称父亲“大(爷)”“叔叔”
父亲去世后儿女才哭“爹”

现在，孩子称呼自己的父亲“爸爸”或“爹”是很正常的事，而在20世纪90年代前，在东昌府区南部一带的村庄，称呼父亲时不喊“爹”或“爸爸”，而是叫“大爷(后演变为‘大’)”和“叔叔”。“俺喊父亲喊了一辈子‘叔叔’，直到父亲去世时才改口哭‘爹’，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老辈子就是这么传下来的。俺老家那一带的村庄以前都这样叫。”东昌府区侯营镇村民王先生说。原市史志办副编审汪庆峰表示，在这些村庄，为什么父亲在世时不喊“爸爸”或“爹”，而是喊“大爷”或“大”“叔叔”，其背后有历史民俗文化因素的影响。

经采访和查阅史料，记者了解了两种说法似乎能解释这种特殊的称呼方式。一种说法是，公元220年，曹丕篡位称帝，汉献帝刘协被降为山阳公，山阳就是现在的河南焦作。做了亡国之君的汉献帝刘协在封地内体察民情，甘心与民同忧，躬耕菜圃，济世悬壶，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好名声。为让子孙不再遭受朝代更迭的迫害，以期家族人丁兴

旺，刘协让儿女叫他“大爷”或“叔叔”，后来“大爷”口语化为“大”，这一特殊习俗在焦作一些地方一直沿用至今。聊城民间文史学者刘洪山表示，明朝初年，山西向东部移民，当时说的山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山西，而是山西南北一带，也包括现在的河南焦作。当时，焦作的一部分移民来到聊城，因此，聊城部分地区形成称呼父亲为“大爷”“大”或“叔叔”的习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另一种说法是，以前农村生活条件不好，生了孩子很容易夭折。为了能保住孩子，孩子一出生，父母就让先生排八字，以趋吉避凶。若小孩跟家里人特别是父母相克，就要过房给别人养育，或拜大树、石碾等为“干爹”“干娘”，那么自己的孩子在称呼自己时就要疏远一些，喊父亲“大爷”“大”或者“叔叔”，待父亲去世后再改口哭“爹”。

可见称父亲为“大爷”“大”“叔叔”仅是一种民间沿袭下来的习俗，各个地方的叫法也不尽相同。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称谓方式也逐渐被更加准确、简洁的称呼所代替了。

被立生祠的高唐知州王大化

民间·故事

高唐 张堂玉

明朝有个读书人叫王大化，字元成，号北湄，江苏仪征人，江南乡试第一，正德十六年考为进士，嘉靖二年任高唐知州。

他到任后，高唐州城东一带遭遇大水灾，城东六七个村庄农田被淹没，房屋进水，灾区百姓纷纷外逃谋生。大水退后仍无人返回恢复农耕生产。面对民不聊生的荒凉景象，王大化寝食不安，迅速采取措施安顿灾民，恢复农业生产。一是打开官仓按人定量无偿发放救济粮；二是发放无息贷银让农户购买种子农具等；三是由州署购买一百头耕牛让农户轮流无偿使用；四是向朝廷奏请免征三年赋税。这些措施落实后当年就有一千多户返回，第二年就全部

陆续回归了。

大水退后，王大化率领同僚到灾区调查，找到了受灾原因：一是原高唐知州唐祯组织开通的唐公沟，经四十多年的淤积，变浅变窄不能排洪；二是天齐庙湾也因淤积变浅失去了缓冲洪水的蓄水池作用。回衙后，他决定尽快加宽加深唐公沟，恢复其排洪功能，同时也对天齐庙湾进行清淤加深。

随后，王大化加紧筹集工程款，但府库存银不能满足工程所需。听说王大人要重挖唐公沟根除水患，城乡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捐粮支援。不到一个月工程款就凑齐了，王大化率领民工开始施工。为加快进度，王大化经常脱下官服与民工一起劳动。一位老者见状感动地说：“我活了七十多岁从来没见过五品大官和老百姓一起干活的！王大人真是老百姓的好官！”在王大化的带动下，原本两个月的工程仅用四十二天就完工了。清淤加宽唐公沟的工程量几乎相当于又开挖了一条唐公沟。另外，为了方便河沟两边的往来，王大化又搭建了十二座木桥。半年后，雨季来临，连续下了三天的大雨，原来的水灾区基本没有积水，肆虐一时的水灾被消除了。

王大化主政高唐期间，不但兴利除弊关注民生，还特别注重教育事业。一天，王大化到文庙和学堂察看，看到文庙学堂多年失修破旧不堪，就拨出银两立即修缮，并新盖了五间学堂让更多的少年读书。公务之余，他还亲自给学童们授课，为他们讲解孔孟之道、诗词歌赋，鼓励他们读书成才，长大后为民造

福报效国家。

王大化在讲学时有好几次看到窗外有个少年在窥听，就将其叫进来询问。少年说自己是城外东关人，姓于，没名字，大家都叫他“狗蛋”，父母双亡，因无近亲，所以在城里沿街乞讨为生。路过学堂时，被读书声吸引，所以常常来窗外听课。王大化见狗蛋虽衣衫褴褛但眉清目秀，左眉头有一颗大大的朱砂痣，眉宇间有一股英气，就说：“你既然喜欢读书以后就来读书吧。你也不用乞讨了，膳食费学费我替你支付。成了读书人就不能叫狗蛋了，我给你起个名字叫尚文吧。”狗蛋感动得泪流满面，连连磕头感谢王大人的再造之恩。

王大化不但重视教育还热衷于修志，他虽政务繁忙但仍亲自主持编修了六部高唐州志中的一部——嘉靖(壬午)《高唐州志》，为后人研究发掘高唐历史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嘉靖五年，王大化擢升为嘉兴府同知。临行时，州民送行者不下万人，哭泣之声震动林野，送行的队伍从东关到姜店络绎不绝。王大化不得不马劝返。送行的人都返回了，但狗蛋仍执着地送到南镇才与王大人洒泪告别。高唐州民为纪念这位为民谋利的好官、能官，使子孙后代不忘他的功德，决定为他立生祠。由义官(参加政府管理但不编制不领俸禄的官员，大多是富户)杜鏐捐地三分，乡耆(民间德高望重的人士)及州民百姓捐银在州城里集市南端为王大化修建了一座生祠——王北湄祠，生祠落成后，每逢初一、十五来祭奠的人绵延不绝。

嘉靖十七年正月十五，当天来祭祀王大化的人格外多。天近中午时，听到一阵锣声，远处一队官差簇拥着一乘官轿缓缓而来，人们知道这是一位官员来祭拜王大人来了。到祠堂落轿后，下来了一位二十多岁的官员，左眉头上有一颗大大的朱砂痣。围观者中有人说道，这不是东关的于狗蛋吗，他现在做了官了？这位官员就是当年王大化收留在学堂读书的于狗蛋，只不过，他已是临清州同知(副州官)了。他缓步进入祠堂亲自摆上祭品行三拜九叩大礼然后宣读他的生祭祭文。祭文如行云流水、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催人泪下，倾诉了王大人胜过父母的再造之恩，并发誓一定要做像王大人一样的好官、清官。

二十多年后，由于祠堂无人看守管理，“栋宇几堕，庙貌几剥”。乡耆尹安说，虽然王大人已调离高唐二十多年，但王大人在高唐施善政惠民爱民的恩泽不能忘，应该尽快修复生祠。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当时的知州桑葵后，得到了其大力支持，州民听到这件事后也都捐钱赞助。一个月后，祠堂修复如初并在祠堂外加盖了两间房子让专人值守，州民又恢复了初一、十五祭祀活动。

寒来暑往日月如梭，一百多年后明朝盛极而衰。历经多年的战乱，高唐州被反复攻占。城内庙宇包括王大化生祠都毁于战火甚至片瓦无存，生祠纪念碑也不知流落何处，但王大化在高唐施善政、除弊端、修水利造福百姓的口碑却一代代传了下来。